

东千佛洞第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研究^{*}

常红红

内容摘要：本文讨论了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南壁东侧之壁画。首先，依据印藏佛教艺术的脉络，将具有波罗（Pāla）风格的主尊定名为《宝源百法》（རྒྱ རྩ ལྷ ད ས ཤ ཉ ཁ）与《纳塘百法》（རྒྱ རྩ ལྷ ད ས ཤ ཉ ཁ）中收录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在此基础上，结合 11—13 世纪西藏遗存的相关造像实物，考证西夏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的图像来源，以及与藏传佛教噶当派的渊源。结合西夏图像遗例，进一步探讨该观音与六字真言的关系，以及与西夏尊胜佛母图像的搭配等问题，考证该观音图像在西夏文化脉络中的宗教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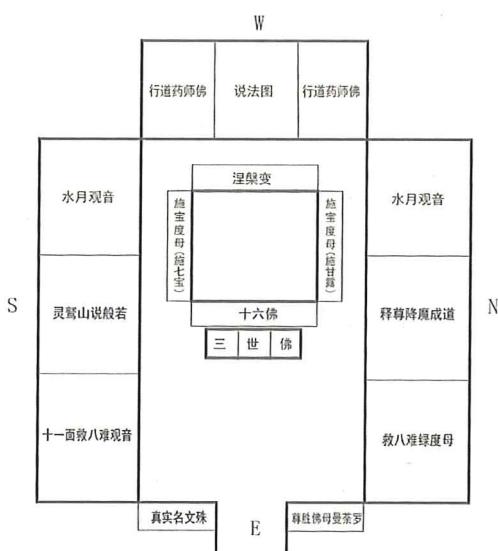
一、前言

东千佛洞位于甘肃省瓜州县桥子乡（距瓜州县城约 80 公里）南 35 公里峡谷河床两岸。其第二窟（以下简称东二窟）在西岸下层，坐西向东，为整个东千佛洞中的最大窟，属甬道式中心柱窟：窟室平面呈长方形，前 2/3 为宽敞的礼拜空间（顶为覆斗形藻井），中心柱占后方 1/3，中心柱正壁前设佛坛（目前为清代改妆过的三世佛塑像），围绕着另三

* 本项目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S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面凿出礼拜甬道。窟内墙面与窟顶皆满绘壁画（图一）。虽然文献史料匮乏，但依据窟内壁画中的供养人、西夏文题记以及壁画风格，可判定此窟为西夏时期所开凿的洞窟。

本文所要讨论的为南壁东侧之壁画（图二），画幅以黑色勾勒四周边框。主尊居画面中央，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白色，十一面八臂，面数从上至下以1、1、3、3、3式



图一 东二窟壁画配置图（常红红绘）



图二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东二窟南壁，12-13世纪（常红红摄）



图三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局部（救蛇难、狮难观音），东二窟南壁，12-13世纪（钟子寅摄）

排列，最上层为阿弥陀佛，其下为蓝色忿怒相，往下第三到第五层共九面。其八臂分别为：主臂双手于胸前合掌，其余六手的右三手分别持念珠、作与愿印、持法轮；左三手持莲花、宝瓶、弓箭。主尊左、右两侧共画八尊胁侍菩萨，上方两侧画乘云而来的天人。另外，壁画左、右侧各画四个方格（共八格），每格内画一尊舒坐姿观音，观音前方各有一人合掌礼拜，并伴有狮、蛇、火焰、水等描绘，可知表现的是观音救度“火难”“蛇难”“象难”“狮难”“水难”“刑难”“劫难”“非人难”，即观音救八难主题（图三）。此外，整铺壁画的最上层画金刚界五方佛及忿怒尊护法两身。从艺术风格来看，此铺壁画中的主尊、眷属菩萨、八尊救八难观音及其他尊像的楔形叶冠和臂钏、轮状耳珰、贴体短裙以及掌心施红等特征，无疑透露出东印度波罗（Pāla）艺术的特点。

关于此铺图像的讨论，最早见于1983年张伯元公布的东千佛洞窟调查报告，判定此尊像为八臂观音曼荼罗¹。其后有刘永增、郭佑孟等学者的研究，两位先学均注意到此铺观音乃是承继印度救八难观音造像的模式。刘永增认为，该观音主尊是依据清代工布查布所译《佛说造像度量经解》中的十一面八臂观音所作²。然刘先生所言的实为莲花色比丘尼（Utpalavarnnā）传承之十一面观世音，与此铺尽管面数、持物等均相同，但坐立姿不同。郭佑孟注意到主尊十一面的颜色与藏传样式造像仪轨不符，指出可能是延续唐代十一面观音法门的影响，认为以十一面观音和绿度母（按：位于东二窟南壁）的主尊对配方式，是来自敦煌莫高窟的传统³。诸先学的研究虽然都指出此为“观音”“救八难”等特征，也试图寻找其与印度、唐以来救八难主题的关联，以及图像间的差异，然由于对藏传图像不够熟悉，其解读不甚令人满意，甚至试图把不同传承之间的图像以时代的演变来进行诠释。

本文乃从东二窟南壁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壁画入手，考证其所据经典及教法传承，并对西藏、西夏所遗存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进行比较，探讨西夏该观音图像的印藏艺术渊源。结合西夏图像遗例，进一步探讨西夏时期该观音与六字真言的关系，与尊胜佛母及其他尊像的组合，以及11—13世纪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史实。

1 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敦煌研究》，1983（创刊号）：110—111。

2 刘永增：《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观音菩萨、多罗菩萨救济八难曼荼罗解说》，收录于樊锦诗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219—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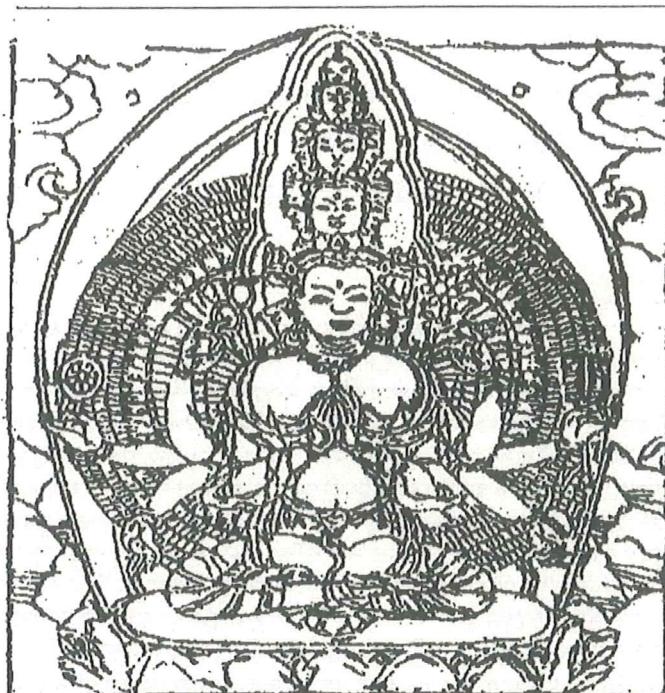
3 郭佑孟：《东千佛洞壁画探秘》，《历史文物》，2006（5）：84—93。

二、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经典依据与图像判定

关于东二窟南壁观音图像尊格的判定，笔者从《宝源百法》（*ਬੋਧੁਵਾਲੁਦਾਤ੍ਰਿਕਾ*）、《纳塘百法》（*ਨਾਂਡਾਵਾਲੁਦਾਤ੍ਰਿਕਾ*）的修法仪轨中找到此尊十一面救八难观音（Ārya Avalokitesvara, ພਾਣਾਸ਼ਾਖਾਵਾਲੁਦਾਤ੍ਰਿਕਾ）的成就法，依据《宝源百法》记载（图四）：

八瓣莲花中央是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结金刚跏趺座。其十一面，自下而上第一层主面为白色，左面红色，右面绿色，第二、三层分别为红、白、绿色，此三层均为寂静相，第四层为蓝色忿怒相，最顶层是红色阿弥陀佛。观音主尊主臂当胸合十，右面三手分别持念珠、结与愿印（施甘露以止息饿鬼的痛苦）、法轮；左面三手分别持白莲花、净瓶、弓箭。

八瓣莲花上生出八尊救八难观世音。东方为救火难观音，身白色，右边两



नवगुणालाभ्युपर्णिमालालभ्युपर्णिमालालभ्युपर्णिमा

图四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
(图片出自当增扎西编《宝源三百图解》，2007：119)

手施无畏印及持拂尘，左边两手持莲花及月水晶；南方为救水难观音，身白色，右边两手施无畏印及持珍宝，左边两手持莲花和法轮；西方是救狮难观世音，身黄色，一双手施无畏印及持莲花，另一双手持宝石及经书；北方是救象难观世音，身橙色，一双手施无畏印及持莲花，另一双手持乌巴拉花和日水晶；东南方是救刑难观世音，身红色，一双手施无畏印及持莲花，另一双手持钩及索。西南方是救蛇难观世音，身绿色，一双手施无畏印及持莲花，另一双手持幢及水瓶，他立于海魔之上。西北方是救魔难观世音，身黑色，一双手结施无畏印及持莲花，另一双手持三叉戟和旗帜。东北方是救劫难观世音，一双手施无畏印及持莲花，另一双手持铃杵。八尊救八难观音皆为忿怒尊，身着忿怒尊的服饰和饰物。……在顶、额处观想有五方佛⁴。

《宝源百法》中所收录的此尊观音，其跏趺坐姿、十一面八臂、手中持物均与东二窟南壁十一面观音图像完全吻合，二者救度八难内容相同，即火难、水难、狮难、象难、刑难、蛇难、魔难、劫难。依据成就法可知，在此密法观想中，除本尊以外另有本尊化现的八尊救八难观音，他们位居八个方位，即修行、供奉此尊观音即能解脱八难之苦，所以称其为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另外，成就法中提到的“在顶、额处观想有五方佛”亦与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壁画上端的五方佛吻合。

除东二窟之外，东千佛洞第四窟南壁画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一铺，尽管图像极漫漶，

但仍可看到与东二窟一致的内容及构图。主尊为十一面八臂坐像，左右胁侍共八尊菩萨，在图像外围齐整的八个格子内各画一尊救八难观音，观音伸手救度合掌祈拜者。画面顶端画金刚界五方佛及忿怒尊护法神两身，其图像风格亦是与东二窟一致的波罗样式（图五）。

值得注意的是，《宝源百法》中的八尊救八难观音为四臂“忿怒尊”，而东二、四窟中的八尊救八难观音则为二臂“寂静尊”，东二、四窟主尊左右的八尊胁侍菩萨在成就法中也没有记载。事实上，图像与成就法仪轨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在西夏极为普遍，西夏人会依据自己的佛事需求对图像内容进行“添加”或“简化”，其原因尚有待研究。

依据《宝源百法》记载，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传承脉络，首先是印度月宫大师（Chandragomi，7世纪）传至阿底峡尊者（Atisa，982—1054年），依次历经噶当派上师贡巴哇（贡巴哇 1016—1082年）、岗波巴（岗波巴 1079—1153年）等传承，后达隆噶举派上师达隆塘巴（达隆塘巴 1142—1210年）、桑结雅均（桑结雅均 1203—1272年）亦传承此法⁵。从这一传承可知，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成就法最初由阿底峡从印度传入西藏，首先在藏传佛教噶当派内传承，后噶举派亦传承此成就法。

三、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印藏图像渊源

（一）阿底峡传承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遗存

除文献记载之外，在西藏遗存的文物中可见到多件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像，早期作品多发现于西藏西部地区。如阿里地区托林寺所出11—12世纪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擦擦，这些造像躯体修长、细腰、凸起的腹肌等呈现出克什米尔艺术的影响（图六）。美国芝加哥普瑞茨克（Thomas J. Pritzker）收藏有一件11世纪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曼荼罗唐卡（图七），艾米·海勒（Amy Heller）认为该观音主尊为11世纪早期西藏西部特有的一种观音样式，因未找到成就法仪轨，故误认为该观音成就法已失传，此件唐卡的主尊无疑是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此外，艾米·海勒指出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藏有一件十一面八臂坐相观音造像，鑿刻的题记表明该作品的施主属于西藏西部的大译师仁钦桑布（仁钦桑布 958-1055年）家族⁶，亦可见此类观音造像

5 多罗那他：《宝源百法》，281—282页，转引自 <http://www.himalayanart.org/image.cfm/65291.html>。

6 Amy Heller, "Early Paintings from West Tibet and the Western Himalayas in the Margot and Thomas J. Pritzker Collection", *Orientations*, Vol.45, No 5, 2014: 46—48.



图五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东四窟南壁，12－13世纪（常红红摄）



图六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擦擦，托林寺遗址出土，11－12世纪（李逸之提供）

在 11－12 世纪的藏西地区颇为流行。

事实上，西藏阿里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发源地，印度高僧阿底峡应古格王室邀请，于公元 1042 年来到西藏西部的古格王朝传教。据文献记载，阿底峡赴藏时曾携带“三十一驼经像等物”，并在赴前藏途中传“十一面观音”“度母”修法等⁷。从西藏西部遗存的多件 11－13 世纪十一面救八难观音造像可推测，阿底峡从印度赴西藏传法时应首先将该观音成就法传入藏西地区，该观音造像在当地曾一度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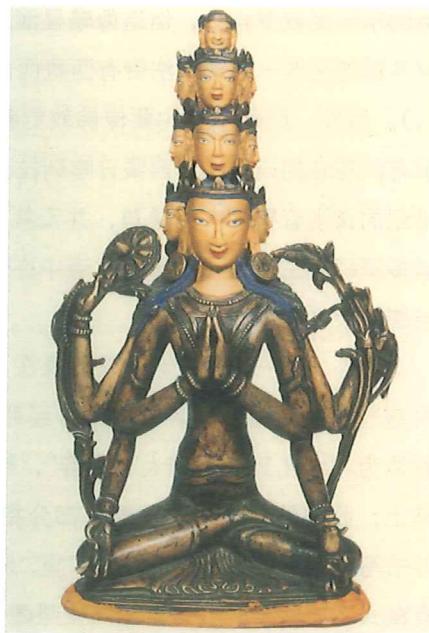
除西藏西部所见的该观音遗品之外，十一面救八难观音造像亦传入西藏腹地。在拉萨地区甲玛赤康村的一座噶当塔遗址中，有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擦擦出土，该塔为 12 世纪噶当派上师卓袞·桑杰温（1138－1210 年）的灵塔，亦可见该观音与噶当派的渊源⁸。此外，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所公布的布达拉宫收藏的两件 13 世纪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金铜佛造像，皆十一面八臂，跏趺坐姿，楔形叶冠和贴体衣饰为典

7 法尊法师译：《阿底峡尊者传》，世界佛学苑，2010：3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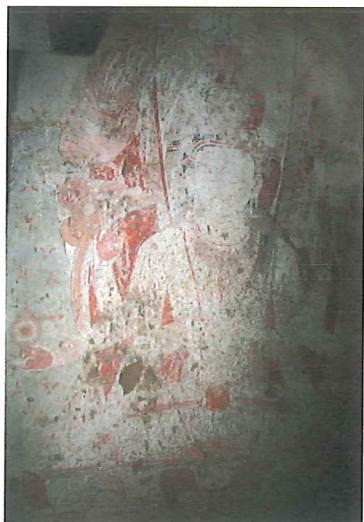
8 范久辉：《甲玛赤康村出土擦擦》，本文尚未出版，为 2015 年于浙江大学召开的“第六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



图七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曼茶罗，11世纪（图片出自 Amy Heller, “Early Paintings from West Tibet and the Western Himalayas in the Margot and Thomas J. Pritzker Collection”, 2014: Fig. 11）



图八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13世纪
(布达拉宫藏。图片出自 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2001: Fig 283D)



图九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西藏拉孜县觉囊塔，14世纪（谢继胜摄）



图十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西藏拉孜县平措林寺，17世纪
(谢继胜摄)

型的东印度波罗样式，但造像略显溜肩、四肢修长、衣纹朴素，以及因胎体较薄将造像部件都连接在一起的做法带有西藏西部造像的特点⁹，该观音造像或是经由藏西传入（图八）。另外，西藏现存的藏传佛教觉囊派寺院中也遗存有该观音图像，表明觉囊派也传承有此观音的成就法。西藏日喀则拉孜县觉囊寺附近的一座觉囊塔龛内，遗存一铺约14世纪的该观音壁画，为单尊，并无其他胁侍（图九）。其后，在公元1615年由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主持修建的平措林寺中亦遗存有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其胁侍为马头明王与善财女（图十）。

另外，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在15世纪亦流传于中原汉地，明宣德六年（1431年）内府刊印的《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收录一幅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版画（图十八），被称为“土儿只缠卜即大悲观音”，带有明显的印藏特点，十一面八臂，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此书的前、后序发愿文部分指出：“绘画西来大宝法王所传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并书写诸品经咒，刊□（板）印施，流传持诵，广种福缘”¹⁰。从序文可知，此刻本中具有藏式番相特点的观音版画乃按照藏传佛教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即明封大宝法王得银协巴（དྲྷ ཟକ୍ର ལ୍ମୋ ཤେ རୀ 1384 – 1415年）所传而作。可知，由噶当派初传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至明代已经由噶举派高僧传于汉、藏两地。

由以上讨论可知，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成就法约11世纪中期由阿底峡从印度传入西藏，之后主要在噶当派内部传承。事实上，除了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之外，东二窟还另遗存有噶当派传承的图像，如北壁的救八难度母、东壁的顶髻尊胜佛母等，这些由噶当派传承的多铺图像出现在东二窟颇让人意外和惊奇。笔者推测，这些图像的传入可能与12世纪早期西藏噶当派僧人在西夏弘法有关。依据日本学者井内真帆的研究，热振寺第五任堪布祥·沃觉哇（羌 · 祥 · 沃 · 觉 · 哇 ? – 1150年）在任期间，其弟子们与西夏王室建立了供施关系，该研究提供了噶当派与西夏王室之间约12世纪早期就建立供施关系的重要证据¹¹。另外，井内真帆在黑水城遗书中发现了与噶当派有关的五个写本。由于相关史料奇缺，我们目前尚无从确切考证西藏噶当派僧人在西夏的弘法活动，以及噶当派教法在西夏的传播状况，但东二窟与噶当派相关的壁画遗存或可提供文献缺载的新线索。

尽管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成就法是阿底峡噶当派所传，但该成就法并非仅限在噶当派

9 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two*,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Ltd., 2001: 1097, pl. 283D, 283E.

10 国家图书馆编：《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38 – 39。

11 Maho Iuchi, "A 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ka' gdams pa School and Minyag/ Xixia", 《藏学学刊》，2012 (8) : 58 – 62。



图十一 救八难观音，印度奥兰伽巴德石窟第七窟，6世纪
(图片出自星云大师总编《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2013：1617)

内部独修而不外传，约12世纪中期噶举派亦传承此法。所以，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也不能排除是噶举派僧人赴西夏传法时传入¹²。

(二) 印度“救八难观音”构图模式的影响

由前述讨论可知，《百源宝法》中收录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成就法最早由阿底峡从印度传入西藏，但依据笔者目前调查，印度并未发现此种十一面八臂的坐姿救八难观音遗存。尽管如此，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采用的构图样式，仍可追溯至印度早期的观音救八难造像。如年代约6世纪的印度奥兰伽巴德石窟（Aurangabad），在第七窟正门右侧刻观音救八难雕像，主尊位居中央，一面二臂，在其两侧左右对称的格子内雕出救八难情节。八难内容从上至下依次为火难、刑难、劫难、水难、狮难、蛇难、象难、魔难，

¹² 关于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在西夏的活动，参见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1）：33—49。

观音位于每一方格的内侧，似从天而降，中间是祈拜的人，格子外侧刻具体的“灾难”（图十一）¹³。另外，在印度堪赫里石窟（Kanheri）、阿旃陀石窟（Ajanta）、埃罗拉石窟（Ellora）中也存有多处这类构图的6世纪救八难观音造像。

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在形式上无疑沿袭了印度早期救八难观音造像的构图模式（图二）。首先，二者都将主尊安置在画面中央，主尊上方一层为五方佛或诸佛，主尊上方左右侧画天人。最重要的是，二者都将救八难分别画在排列规整的八个格子内，每个格子的构图皆由观音、被救度的人、八难之一三部分组成。在图像配置上，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北壁救八难度母搭配，观音与度母的配置也来源于印度传统。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的《大唐西域记》，在卷八中记载玄奘在印度所见观音搭配度母的作例：“至摩揭陀国鞬罗释迦伽蓝，（中略）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罗菩萨像，右观自在菩萨像。”¹⁴此外，印度堪赫里石窟第九十窟，救八难观音的左右胁侍为两尊度母；7—8世纪的埃罗拉石窟中也有观音与度母搭配的例子。另外，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一件12世纪的东印度贝叶经《般若八千颂》（*Astasahasrikaprajnaparamita*），内有施宝观音与施宝度母搭配的插图¹⁵。

四、西夏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其他图像的组合

除东二、四窟之外，西夏另遗存有多件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在西夏石窟寺及西夏刊印的经版插图中，该观音多与尊胜佛母搭配，在黑水城所出的唐卡遗品中，则搭配方式多样，但二者均“遗失”了救八难内容。

（一）与尊胜佛母搭配

（1）十一面救八难观音 + 尊胜佛母版画

黑水城所出的西夏新译佛经《圣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本（刊印于1149年前后），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尊胜佛母作为附图亦组合在一起。两幅版画构图为左右双栏，主尊被画在左栏，四尊胁侍菩萨在右栏。主尊与胁侍菩萨的

13 星云大师总编：《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台北：佛光山文化出版社，2013：1617。

14 《大藏经》第五十一册，No. 2087：913。

15 参见常红红：《论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施宝度母图像源流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2）：图版14。大都会博物馆藏品编号：2001.445。



图十二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 / 尊胜佛母版画，12世纪中期（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图片出自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4》，1996：29－30）

服饰、姿态为东印度波罗形式，但围绕着尊像背光的祥云、画面上部的凤鸟、天空中飘荡的乐器等图案，乃是常见于中原汉传佛画里的元素。与东二窟更为纯粹的印藏波罗样式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相比，此版画显然已受汉风影响，年代应当比东二窟图像要晚（图十二）。此观音 / 尊胜合刻陀罗尼经在西夏极为流行，1991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内发现的一批西夏文献中有西夏文刻本《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集》残页，与《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前后相连（以下简称“绿城本”），存跋尾，译文如下：

今《大悲心总持》者，不虑威德，无量神力，所为爱乐，随意具足，一如所愿，悉皆成就。因有如此功德，先后多所刻印，持诵者众多，印版速见损毁，故郭善真复令新刻印版，以便受持。若有赎以受持者，可来殿前司西端赎之¹⁶。

该绿城本跋尾表明，因持诵者众多，此经被反复刻印，以至于印版很快损毁而复雕新版印刷。从此本的插图尊胜佛母版画可见，该“新刻印版”版画与前述黑水城本相比颇显粗糙，胁侍菩萨手中持物均已被“删减”，但依据图像布局、尊神样式仍可看出二者乃是依据同一粉本刻印。绿城本被明确告知去殿前司西端赎买，此经应当属于一官刻本，应为西夏官方所推行的信仰体系，观音 / 尊胜图像组合亦随着官方推行该经而在西夏广为流行。明代，《圣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两部

16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10）：75，图版八。

陀罗尼经亦流传于明宫廷，或是经由西夏传入了中原汉地¹⁷。

(2)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 + 尊胜佛母壁画（东千佛洞第七窟中心柱南、北壁）

东千佛洞第七窟（按：以下简称东七窟）中心柱南壁画一铺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曼荼罗。主尊十一面八臂，结跏趺座，肤色已氧化为黑色（应为白色）。主尊左右两侧各画一尊跪坐姿的胁侍菩萨，二菩萨皆双手于胸前合掌持莲花，应为两尊胁侍观音。主尊上方左右各画一组人物，前方一位撑伞而行，后面跟着一位手托供物，应为二供养菩萨。此铺图像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印藏波罗风格，主尊背龛上彩色条纹状的“虹光”与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主尊背光相似，但东七窟并未选择“救八难”内容。在与东七窟中心柱南壁对称的北壁，则画一铺尊胜佛母曼荼罗，可见救八难观音 / 尊胜佛母这一固定组合在西夏已是流行样式。

(3)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 + 尊胜佛母壁画（莫高窟第四六五窟窟顶西披）

莫高窟第四六五窟为西夏窟，窟室壁画皆为藏传佛教密宗题材。在窟顶西披画金刚界五佛之无量寿佛说法，主尊无量寿佛居中央，诸弟子、菩萨围绕左右听法，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尊胜佛母作为主胁侍菩萨出现在佛陀左、右两侧¹⁸（图十三）。

将观音、尊胜陀罗尼经合刻，或将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尊胜佛母图像固定搭配在一起，笔者从印度、藏传佛教图像体系中并未找到相关的作例。可见这一传统并非源自印藏，而应当受中原地区所造尊胜大悲经幢的影响所致。唐代以来，中国兴起建立佛顶尊胜经幢的风潮，并在尊胜经幢上兼刻他咒，其中以刻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为最流行，并出现“尊胜大悲陀罗尼幢”这样的名称¹⁹，这两部经咒具有无上威力，能为诵持者提供一条快速解脱之道，建幢多以荐亡追福为目的。可见，西夏将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尊胜佛母搭配，该配置方式乃受中原汉文化影响

17 明代永乐九年至永乐十年（1411 – 1412年），南京内务府御制泥金写本《大乘经咒》，四卷四册，附图29幅，“为历代流传经咒与元代汉译西藏咒语的辑录”。事实上，《大乘经咒》中收录了多部西夏新译并流行的佛经，其卷二收录的《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第3 – 7开）、《佛顶尊胜总持经咒》（第8 – 13开）即为西夏时期新译并合刻在一起的陀罗尼经。在《大乘经咒》中，二者亦前后相接，并附“尊胜佛母”插图。参见葛婉章主编：《藏汉艺术小品：佛经附图》光碟，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2003年。

18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图版34。

19 敦煌遗书S.2566、S.5598将大悲、尊胜陀罗尼经合抄在一起（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78、174）；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吕氏为追荐亡夫所建《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宋代李恕所建经幢刻尊胜咒、大悲咒，并说明并刻的原因：“盖闻忏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真言”。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郭重显为其父母所造的墓幢上题：“奉为考妣二灵，特就坟所，于东南隅建尊胜大悲经幢一所。”此外，辽道宗寿昌五年（1067年），僧人慈智大德的墓幢，题“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经幢”。参见刘淑芬：《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1997：664。



图十三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 / 尊胜佛母，莫高窟第四六五窟，12 – 13世纪（图片出自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1998：图版34）

所致，将二者作为“观音咒”与“尊胜咒”的化身而备受崇奉。

（二）其他搭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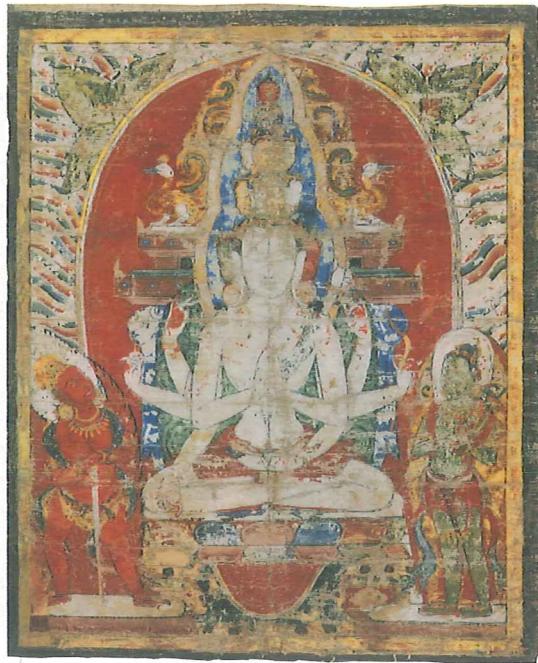
除西夏石窟寺之外，黑水城所出西夏遗品中另有4件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含一残件），均无救八难内容，主尊与胁侍的配置也无统一标准。第一件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编号X-2355），主尊最上方是金刚界五方佛，背龛上方左、右各画一位僧人，主尊左、右侧画菩萨装四大天王，下方的四尊胁侍菩萨从左至右分别为马头明王、白伞盖、摩利支天、绿度母，但这样的配置未找到明确的仪轨依据（图十四）²⁰。另一件唐卡，主尊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分别胁侍马头明王与绿度母，马头明王乃是观音的忿怒相化现，绿度母亦是观音的化身（图十五）²¹。在第三件唐卡中，主尊左右各胁侍一尊手持莲花的观

20 [俄]彼得洛夫斯基 (Piotrovsky) 编, 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 台北: 历史博物馆, 1996: 图版12。

21 K. F. Samosyuk, *Buddhist Painting from Khara-Khoto, XII-XIVth Centuries*, St. Petersburg: 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 , 2006: pl.115.



图十四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13—14世纪（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图片出自[俄]彼得洛夫斯基[Piotrovsky]编，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1996：图版12）



图十五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13—14世纪（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图片出自 K. F. Samosyuk, 2006: Fig.115）

音菩萨，此幅唐卡的简略结构与东千佛洞第七窟的该尊配置更为相近（图十六）²²。第四件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残件），仅遗存整件唐卡约 1/4 面积，是一件深受汉风影响的藏式作品，主尊十一面以 1、1、3、3、3 式排列、与仪轨符合的主尊持物，以及画面左侧上方的净居天等皆是依照藏式范例而作，主尊十一面中的忿怒相，以及净居天的曲腿式跪坐姿、穿贴体短裙等都可见印藏波罗艺术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画面整体呈现浓厚的汉风影响，主尊的样貌、服饰已是完全的汉式笔描，可以说这幅唐卡表现了西夏画师对于印藏波罗风格本土化的一种尝试（图十七）²³。

西夏黑水城出土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主尊与眷属配置多样，且并未遵循仪轨中观音与八难的搭配模式，而是多与度母、马头明王等观音的不同化身搭配。此图像

22 K. F. Samosyuk, 2006: pl.114.

23 K. F. Samosyuk, 2006: pl.116.



图十六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唐卡，13—14世纪（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图片出自 K. F. Samosyuk, 2006: Fig.114）



图十七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残件），13—14世纪（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图片出自 K. F. Samosyuk, 2006: Fig.116）

配置可从印度密教成就法集《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 中找到相关线索，《成就法鬘》中共收录了 15 种观音成就法（未收录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成就法），其中世尊观音 (*Lokannātha*) 的胁侍菩萨为度母、马头明王；水月观音 (*Khasarpaṇa*) 胁侍为度母、马头明王、善财童子、颦眉佛母²⁴。笔者认为，黑水城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的配置可能是受到印度不同观音成就法影响下的“混搭”。

从图像风格来看，西夏石窟寺壁画、黑水城出土版画及唐卡中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主尊及眷属均皆以璎珞庄严，戴楔形叶冠和臂钏，下身穿贴体短裙、掌心施色，

²⁴ B.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 1987: 128-132.

以及胁侍菩萨呈三折枝式造型等特征，均透露出强烈的印藏波罗艺术的影响，该图像来源于印藏传统无疑。

(三) 不同搭配方式的原因探析

西夏遗存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大致有三类配置方式：1. 主尊搭配救八难内容（仅存东二、四窟）；2. 主尊与尊胜佛母组合；3. 主尊虽无固定搭配对象，但多与度母、马头明王、观音等组合。以笔者管见，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尊胜佛母组合，属国家推行的“官方佛教”体系，如《圣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二经，其传者是来自印度的西夏国师，译出之后在国家举办的超度大法会上使用，并被大量刊印普施国内，经中插图选用六字大明咒和大悲咒化身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以及尊胜咒化身的尊胜佛母，以灭罪度亡及祈福消灾，这一组合在西夏经官方推行自上而下逐渐渗透民间并在国内流行。西夏石窟寺中所绘的二者组合，则属于民间佛教信仰受官方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并逐渐“省略”了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成就法中的八难内容。

然而，黑水城遗存的4件西夏唐卡均无一例与尊胜佛母搭配。事实上，西夏人刊施佛经、修建石窟佛寺主要是为了祈福消灾、超度亡者等世俗功利需求，石窟寺还会作为举办佛事道场的场所。而唐卡则主要是信徒修行密法时观想所用，是辅助密法修行的工具，二者在使用、功能上的不同使得同一图像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五、从西藏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到西夏大悲观音

在黑水城及西夏故地出土了多部西夏刻本《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俄藏编号TK164、165，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集》合刻）。该经扉画为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四尊胁侍菩萨，主尊十一面八臂，跏趺坐于莲花上（莲座下方有莲华部梵文种子字 *hriḥ*），其坐姿及手中持物皆与东二窟救八难十一面观音完全一致，具有浓郁的东印度波罗特点（图十二）。

该经由来自克什米尔的西夏国师拶也阿难捺（Jayānanda）所传²⁵，被认为是在西

²⁵ 依据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教授的研究，拶也阿难捺是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人，约12世纪中期曾在西藏活动，藏文典籍中保存与他有关的两部著作，即将《因明入正理论》译成藏文和对《入中观论颂》的注疏。他还在桑浦寺与中观派论师恰巴·却吉僧格（1109—1169年）进行公开辩论，后来离开西藏，去西夏之后被奉为国师。参见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Jayananda. A Twelfth Century Guoshi from Kashmir Among Tanggu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7(3/4), 1993 : 188-197.

夏仁宗天盛元年（1149年）前后依据梵本敷译，是西夏的新译佛经，曾在皇室举办的超度大法会上大量印施²⁶。该经含有大量经咒，经文部分与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Bhagavadharma）所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类同，经咒部分则与唐金刚智译本《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一致，乃是一部“集自观音诸经”的咒经²⁷。该经的经咒分为心咒与总持两部分，心咒为“唵麻祢钵二合铭吽”，即汉译六字真言²⁸，总持即大悲咒，与上述唐代伽梵达摩译本经咒类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部唐译经典中均无六字真言，西夏新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在两部唐译经典的基础上添加了六字真言。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是这部“集自诸经”的咒经的人格化，是六字真言和大悲咒的化身（其心咒是六字真言，咒语为大悲咒）。《宝源百法》指出，若念诵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的长咒（即大悲咒）有困难，可在念诵数遍之后主要念诵六字真言。因此，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在西夏也被称为“大悲观音”²⁹，因其集诸经、诸经咒于一身，持诵亦可长、可短，遂在西夏广为流行。该“大悲观音”或经由西夏传入中原汉地，刊刻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的《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收录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其心咒为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得弥吽合二”，亦被称为“大悲观音”，在后序部分指出以“大悲”等诸品经咒拔济群品，方便度人（图十八）³⁰。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在西藏成就法仪轨中强调其救八难的特质，而在西夏则强调其“神咒威灵”，谓之“自在大悲”。西夏仁宗皇帝亲撰《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发愿文称：“若有志心，诵持”大悲咒“一遍或七遍，即能超灭百千亿劫生死罪，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随缘往生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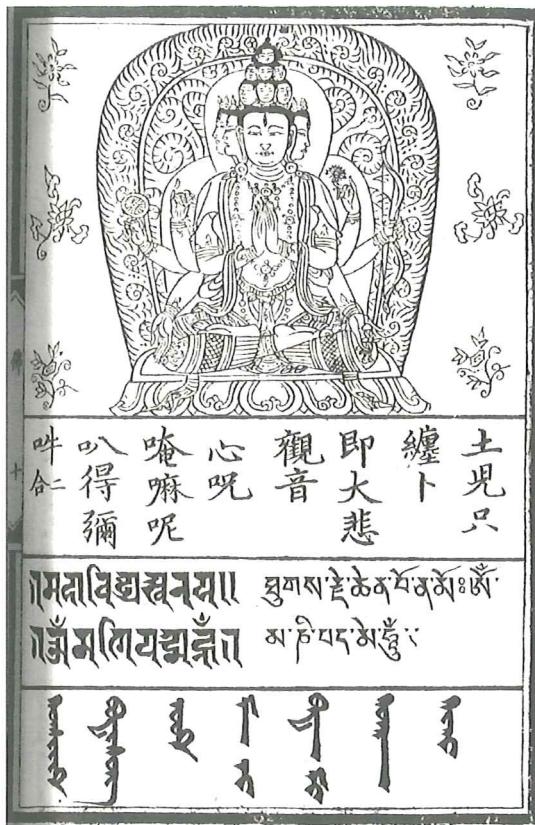
26 孙伯君：《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考》，《敦煌学辑刊》，2006（6）：34—41。

27 沈卫荣：《汉藏文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比较研究》，《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7-328。

28 六字真言又称“六字大明咒”，梵文称 *om manipadme hūm*；藏文称 *om ma ni pad me hūm*。从密教角度讲，六字真言是集诸佛思想的主体，为一切如来的加持，堵截六道众生的生门而净除障碍。传松赞干布所著《尼玛全集》称，六字真言之“唵”字净堕天之苦而断非天处；“嘛”字净非天之征战之苦而断非天处；“呢”字净不变之苦而断人处；“叭”字净恶趣使役之苦而断恶趣之生门；“咪”字净饿鬼饥渴之苦而断饿鬼之处；“吽”字净地狱寒热之苦而断地狱之门。关于西藏六字大明咒详解，参见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6—162。

29 黑水城所出《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首题之后有呼语“敬礼圣大悲心观自在”，白口上有经名简称“大悲”。可见，该经尊格化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在西夏亦被称为“大悲观音”。另，“大悲观音”通常是指“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而十一面观音实际名称当为“十一面千手观音”，但在绘画或雕塑作品中，通常只表现主臂，其他千手均省略。千手千眼观音亦具有救度八难的功能，所以，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又被称为“大悲观音”并不足为奇。[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152—153。

30 国家图书馆编：《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41。



图十八 大悲观音（图片出自《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2011：41）

六字大明心咒”与“顶放污垢光一切如来心陀罗尼”合刻，经文部分阐述了诵持六字大明咒的无量功德及所获利益³⁴。还有一部西夏僧人智广、慧真于天庆七年（1200年）辑录的《密咒圆因往生集》残卷（TK271），其中亦收录“六字真言”。³⁵六字大明咒在西夏还具有追荐亡者的作用，西夏天庆七年（1200年）仇彦衷所施《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

中。”³¹其身份从西藏救八难观音到西夏大悲观音的转变，其原因也在于西夏人对真言密咒的重视，集诸种密咒于一身的该十一面救八难观音遂成为具有灭罪、度亡功能的西夏“大悲观音”。

另一方面，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心咒为“六字大明咒”，诵持简单、有效的“六字大明咒”传入西夏，亦快速成为当时最广为诵持的经咒。黑水城所出西夏文献中有多件与“六字大明咒”相关，如乾佑十六年（1185年）由比丘智通刊施的《六字大明王功德略》（TK136），指出书写六字大明陀罗尼一遍等于敬礼、供养一切诸佛菩萨，能获得的巨大福报³²；另一件《圣六字大明王心咒》（TK137），与其他经咒合刻，强调了持诵、书写“六字大明咒”的种种不可思议之功效³³；在黑水城文献TK102中，“观自在菩萨

31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0。

32 该经云：“若有人书写此六字大明陀罗尼者，则同书八万四千法藏，若有人以天宝造作如微尘数佛像，已（以）一日中庆赞供养所获果报不如写此六字大明王陀罗尼者，是一切诸佛菩萨之所以敬礼者，念一遍即同供养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具述。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73－175。

33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3》，1996：191－192。

34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2》，1996：397。

35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4》，1996：359－363。

尼经》(TK135)为过世的父母祈冥福，题记为“右愿印施此经六百余卷，资荐亡灵父母及法界有请，同往净方”。³⁶此外，六字大明咒还与西夏葬俗结合被书写在墓室中，如甘肃武威的3座西夏墓中发现有梵文、汉文书写的六字大明咒³⁷。在西夏佛教施食仪式中，持诵“六字真言”还具有召请诸佛、菩萨受食的功能³⁸。

除文献记载之外，莫高窟西夏窟第四六四窟主室窟门上方处书写兰扎体梵字六字真言³⁹，以梵字六字真言加持以增强该窟之神力，具有统摄全窟之意。

由以上讨论可知，六字真言在西夏极为流行，被广泛用在西夏佛经刊印、石窟寺以及墓葬中。事实上，黑水城所出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其心咒、咒语为“六字大明咒”与“大悲咒”，该观音传入西夏后等同密教的大悲观音，成为两种经咒的化身，具有灭罪、度亡的功用，且被用作新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的插图，并随着该经在西夏广为流传。

西夏重视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的神咒功用，此观音的“救八难”特质或被逐渐忽略乃至不为西夏人所选择。依据目前所遗存文物看，西夏遗存的“观音救八难”图像多是依据汉传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普门品》所作，与印藏佛教体系中的观音救八难在内容、形式上皆不尽相同。黑水城出土多部该经的汉文、西夏文刻本，多刊有观音救度八难插图⁴⁰，除此之外，观音救八难还被使用在西夏其他各类观音经中。

另外，四臂观音也常被称为六字观音，与六字真言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依据谢继胜教授的研究，在14世纪以前，四臂观音图像的应用与六字真言并无直接对应关系⁴¹。以

36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3》，1996：171—173。

37 1997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墓，其中一号墓出土的木缘塔上书写有梵文六字大明咒；1999年在武威发现一座西夏天庆八年（1201年）的砖室火葬墓，墓内竖木牌5个，以汉字书写“唵麻你钵名吽”“药师留梨光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另一块木牌上书写亡者姓名“唐吉祥、唐奴见”。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90。

38 黑水城遗书中一件残页云：“□字大明咒王围绕心中哑字，离诸妄念而诵□也……行人欲放施食者于净器中盛，所办食净水沃之自身顿盛，圣者诵六字咒召请诸佛菩萨及……其中浩淼广大，若人能于此咒发信敬心者，福德超彼大小积滴以成滴数，亦可知之神咒一遍功德难比世间天地山林河海，犹可担持明咒一……”参见李逸友编：《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220。

3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莫高窟第四六四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图版42。

40 黑水城所出西夏刻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TK90)，插图版画为观音救八难图，主尊为水月观音，诸难从左至右有“恶兽围绕”“或囚禁枷锁”“刀兵段段坏”“如日空中住”“蛇及蝮蝎”“火坑变成池”“还着于本人”“云雷鼓掣电”八难。另还有该经的其他版本TK167等，皆附“观音救八难”插图。参见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2》，1996：326；《俄藏黑水城文献·4》，1996：58。另外，黑水城西夏刻本《佛说观世音经》(TK92)及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B51·002)，卷首插图皆为观音救八难。

41 谢继胜：《平措林寺六体真言碑考——兼论蒙元之际四臂观音信仰与六字真言的流布》，待刊稿。

目前遗存的文物看，四臂观音图像在西夏要远少于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后者应当是西夏流行的大悲观音与六字观音。

六、结语

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在《宝源百法》《纳塘百法》中收录有该尊的成就法，其教法来源为阿底峡传承的噶当派，在西藏仍遗存有多件 11—12 世纪该尊的图像遗存。东二窟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西夏 12 世纪中期的同类图像相比，呈现出更加纯正的印藏波罗样式的影响：1. 东二窟该尊基本上遵循了成就法仪轨（尽管将胁侍的“忿怒像”观音换成“寂静像”）；2. 在图像构图上受到印度早期救八难观音样式的影响；3. 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与救八难度母的搭配方式亦是遵循印藏模式。相比较而言，呈现更纯粹的印藏样式的东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或是 12 世纪早期藏传佛教噶当派（或噶举派）僧人从西藏传入，其年代可能比黑水城所出的 12 世纪中期的同类作品要早。

除东二、四窟之外，东七窟、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黑水城经版画中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均与尊胜佛母搭配。观音、尊胜组合受唐代以来中原地区“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影响所致，因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心咒、咒语为“六字大明咒”和“大悲咒”，将其作为两种咒语的化身，强调其灭罪与度亡的功效，在西夏极为流行。十一面救八难观音信仰于 11—13 世纪在河西地区一度兴盛，然 14 世纪以来该尊造像在藏、汉两地却骤然减少。其原因或与元代独崇萨迦派有关，随着 13 世纪之后噶当派的衰弱，其传承的该尊观音便不再流行。尽管西夏新译经典《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集》在明、清汉地仍有流传⁴²，但该经附图“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却不复出现在经典中（尊胜佛母图像仍存）。

◆ 常红红 女，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⁴² 见注释 17，明代泥金写本《大乘经咒》中辑录西夏新译佛经《圣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并附图“顶髻尊胜佛母”，但并未选择与其固定搭配的“十一面救八难观音”插图。